

# 百年中欧政党交往：特点、经验与展望<sup>\*</sup>

石晓虎

**内容提要：**建党百年之际，梳理归纳百年中欧政党交往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通过对百年中欧政党交往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大多从对欧政党交往开始，进而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对欧政党交往之路。百年中欧政党交往浓缩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精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显著特色和具体经验。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影响下，中欧关系出现新的复杂敏感因素，中欧政党交往面临新的难题。展望未来，中欧政党交往应立足战略高度，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推进发展新型政党关系，切实破除各种障碍因素，为中欧关系及中欧合作营造有利的政治环境。

**关键词：**中欧政党 百年交往 战略运筹 合作共赢

国外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关注和研究相对不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掌握不足、研究基础相对匮乏。1990年，美国学者迈克尔·亨特等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条件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形成相应的更广泛研究战略成为可能，其中包括可以更好地获取中国共产党文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回忆录以及通过查阅档案与采访个别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撰写的书籍”。<sup>①</sup> 21世纪以来，少数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软实力、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等议题时偶尔提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如有学者2007年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职能部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认为“其开展了‘静悄

<sup>\*</sup>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应对国际挑战的经验与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0LLZZC068）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Michael H. Hunt and Odd Arne Westa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Field Report on New Historical Sources and Old Research Problems,” *The China Quarterly*, No.122, 1990, p.258.

悄’外交,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执政党或政府像中国共产党一样与国外政党、组织及人物保持如此高强度的联系”。<sup>①</sup>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政党外交实践影响的日益扩大,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研究兴趣有所增加,著述增多。2020年,《经济学人》杂志研究团队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培训外国政党干部并传授中国经验。<sup>②</sup>赫里斯汀·哈克内斯奇等人从思想和影响的角度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拓展。<sup>③</sup>茱莉亚·巴德认为:“中国共产党主要与国外执政党建立联系,这会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中国共产党不寻求干涉别国政治,但也与不少国家反对党建立大量的联系。”<sup>④</sup>一般而言,国外学术界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是中国外交的独特体现,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有利于深入了解中国的总体外交以及认知政党外交对中国外交的具体贡献。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重视对欧政党交往。百年来,中欧政党交往历经四个主要阶段,交流层次日益提高,交流内容日益丰富,交流成效日益突出。尽管其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总体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其对国际关系产生的深刻影响,加剧了中欧政党交往的复杂性。中欧政党应从战略角度看待彼此关系,努力从历史演进中把握中欧政党百年交往的特点及经验,进而推动新形势下的中欧政党交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 一 百年中欧政党交往的历史回顾

梳理总结百年中欧政党交往历程需要坚持大历史观,深刻把握时代背景变化、国际关系变迁以及两制关系的变动,立足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目标和任务以及党的对外工作定位,进而形成客观的认识。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

1919年至1920年间,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一批革命先驱通过赴欧留学,实地考察欧洲多国工人运动、了解有关改造社会主张,并由此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

---

<sup>①</sup> David Shambaugh, “China’s ‘Quiet Diplomacy’: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5, No.1, 2007, p.26.

<sup>②</sup> 《英杂志:中国共产党可以和“所有政党”打交道》,环球网, <https://3w.huanqiu.com/a/de583b/414BIIZYHS6?agt=29>。

<sup>③</sup> Christine Hackensch and Julia Bader, “The Struggle for Minds and Influ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Global Outrea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4, Issue 3, 2020, p.723.

<sup>④</sup> Julia Ba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nternational Arm,” [https://www.uva.nl/en/shared-content/faculteiten/en/faculteit-der-maatschappij-en-gedragswetenschappen/news/2021/05/the-chinese-communist-partys-international-arm.html?utm\\_source=miragenews&utm\\_medium=miragenews&utm\\_campaign=news&cb](https://www.uva.nl/en/shared-content/faculteiten/en/faculteit-der-maatschappij-en-gedragswetenschappen/news/2021/05/the-chinese-communist-partys-international-arm.html?utm_source=miragenews&utm_medium=miragenews&utm_campaign=news&cb).

认知,进而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sup>①</sup>上述革命先辈的在欧交往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等欧洲成员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欧洲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的支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还互派代表,深化彼此对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认识与交流。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虽然对中国革命不乏积极意义,但由于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也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的冲击。这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独立自主的思考和探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国内推动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呼吁构建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西班牙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等欧洲共产党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通过各种方式公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予以声援。荷兰共产党、英国共产党等还积极为中国抗战提供物资等支持。1937年11月,“毛泽东和朱德联名致信时任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寻求英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sup>②</sup>与此同时,在欧洲的一些华侨共产党员还以志愿者身份参加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积极贡献,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高度评价。

##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与曲折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主要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外共产党、工人党交往,与欧洲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基本建立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中联部1951年成立后,在党中央领导下,根据工作职能促进党的对欧交往的既有发展。1954年后,英国工党、意大利社会党等部分欧洲国家社会党出于种种考虑,也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彼时在对待社会党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认为不能模糊彼此界限,又认为有必要做好一定层面的统一战线工作。1956年9月,党的八大成功召开,5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派团出席,2个共产党派观察员出席。来自欧洲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德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雷曼、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杜克洛等要员到会祝贺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交流,彰显党的对欧政党交往取得丰硕成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围绕两大阵营斗争在一段时间内相互支持和配合,还就解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一些分歧进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sup>②</sup> Maev Kennedy, “Letter from Mao Zedong to Clement Attlee Sells for £605,000,” <https://www.hitc.com/en-gb/2015/12/15/letter-from-mao-zedong-to-clement-attlee-sells-for-605000/>.

行协调。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矛盾日益突出,两国关系趋向恶化。“由于中苏矛盾的扩大和党内‘左’的思想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关系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变化。”<sup>①</sup>“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对外交往工作产生严重干扰,使得中国共产党对欧交往受到较大冲击。

###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稳步拓展

“文化大革命”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演变和时代主题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深入思考并总结党的对外交往经验教训,谋求妥善处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从指导思想上推动了党的对外交往转变。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十二大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上述“四项原则”最初适用于同国外共产党、工人党的交往,后来也逐步适用于同其他类型政党的交往。由此,中国共产党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坚持求同存异,实现了党际交往的关键性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率先开创性地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恢复关系,推动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继而与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等西欧传统共产党恢复联系和交往,拓展了对欧政党关系;又与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苏联共产党等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逐步恢复关系,进而实现对欧洲共产党关系的整体恢复。此外,同欧洲社会党的交往和对话陆续打开局面。如1981年2月,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率团访华,在两党会谈中,他公开表示:“尽管法中两国相距遥远,但希望两党能建立经常的联系,增进相互了解”。<sup>②</sup>德国社民党主席兼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也于1984年访华,在双方正式会谈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超越意识形态”的概念,这不仅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德国社民党的交往,而且推动党的对外交往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在东欧剧变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外交方针,稳妥推进与原苏东国家的新老政党发展关系。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要“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为中国共产党发展与其他类型政党关系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与法国、西班牙、英国、奥地利、比利时等国右翼政党陆续建立联系。此外,中国共产党还逐步与欧洲社会党、欧洲人民党等地区政党以及欧洲议会的主要党团建立了联系。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政党政治的多样性日益突出。针对欧洲一体化深入演进及欧洲政党政治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还与一些国家的新兴政党如左

<sup>①</sup> 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页。

<sup>②</sup> 王金圣:《密特朗率法国社会党代表团访华》,载《世界知识》,2001年第14期,第38页。

翼党等建立联系,并深化与欧洲地区政党、欧洲议会党团的沟通,以提升对欧政党交往运筹能力。与欧洲主要国家政党的对话也陆续启动,如中德政党对话(2002年)、中英政党对话(2007年)、中俄执政党对话(2009年)。其中,中英政党对话迄今已举办十届,这有利于两国政治家深入交流、增进理解、促进共识、深化友谊。同时随着中欧双方相互重视和期待的增多,双方政党不断提升合作层次。如2010年形成的中欧政党高层论坛,已成为中欧政党交往的标志性品牌。

#### (四)新时代新发展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对外交往。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这为党的对外工作提供了重要准则。习近平总书记还创新性地提出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极大地丰富了中欧政党交往的内涵与外延,促进了中欧政党伙伴关系网络的建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推动与欧洲政党多层次交往,促进中欧文明交流对话,大力宣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努力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增进欧洲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引领中欧政党交流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对欧政党交往中积极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在方式上突出“走出去”“请进来”。其中,针对来访外国政党团组设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专题宣介会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知名品牌,包括欧洲政党在内的国外政党可以通过实地考察、现场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具体实践,加大欧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感性和理性认知。如2021年4月,以“一张蓝图绘到底”为主题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杭州市举行,引发与会外国政党团组的极大兴趣和高度赞赏。其中,“摩尔多瓦社会主义者党执行书记、副议长巴特雷恩察,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总委员会委员谢苗诺夫,法国团结与进步党主席舍米纳德等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长远战略眼光,制定一系列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坚持不懈地向着既定目标努力奋进,是中国取得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关键因素”。<sup>①</sup>

在新时代,对欧政党交往的力度和影响日益突出,具体表现是高层对话不断、团组来访频繁、专题研讨日益深入、实地考察越来越接地气、多边对话影响日益扩大。2017年,中国共产党举办首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欧方政党积极参与,并强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杭州举行》,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04/15/c\\_1127331841.htm](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04/15/c_1127331841.htm)。

调对话会的成功举办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开放和自信,表明中国共产党重视对外交往以及愿意分享治党治国的经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欧政党交往日益显示活力,带动中欧政党交往不断跃上新台阶。上述政党交往有助于欧方深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增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促进务实合作的深度推进。欧洲有关国别政党、地区政党、欧洲议会党团对此予以积极肯定。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政党领袖、时任政府总理的齐普拉斯 2019 年 4 月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伟大的提案,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体现了对世界未来发展的思考,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有助于促进各国发展。希腊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因为它和中国一样,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能够从历史角度理解“一带一路”建设。<sup>①</sup>为促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双方携手构建“中国—中东欧政党对话会”机制,努力推进政党对话平台、民间友好平台、文明互鉴平台、务实合作平台、青年交流平台等平台建设。对话会参与面很广,交流对话十分充分,从而产生了积极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效应。

近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欧政党面对面交流受到一定影响,但借助“云交往”方式如视频对话、在线交流、网络研讨等,保持了相当的交往热度。

## 二 中欧政党百年交往的主要特点

一个世纪以来的中欧政党交往,增进了双方政党的相互了解,深化了彼此合作与友谊,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推进党的阶段性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实现以及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一) 在超越意识形态中不断前行

中欧政党受历史、文化、理念以及发展水平等影响,存在诸多差异尤其是意识形态差异。顺应形势发展变化、超越意识形态差异,是中欧政党交往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对欧政党交往一般侧重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交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重视独立自主以及维护与兄弟党的团结,对分歧和矛盾主张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力求稳妥解决;同时珍惜兄弟党之间的友谊与信任,避免给敌对势力可乘之机。但苏联共产党搞大国大党主义,损害了各国共产党交往的氛围,加之冷战初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如何拓展对外交往,争取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1954 年,毛泽东主席在与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

<sup>①</sup> “Xi Meets Greek Prime Minister,” <https://www.beltandroad.news/xi-meets-greek-prime-minister/>.

礼率领的工党代表团会谈时指出:“我们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不能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能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sup>①</sup> 英国工党信奉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重大区别。因此,这里的和平共处无疑是求同存异的和平共处。同期,周恩来总理在会见艾德礼时表示:“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不应妨碍一国与另一国,一党与另一党之间的政治上的合作”。<sup>②</sup> 在同欧洲不同意识形态政党的交往中,求同存异就是要敢于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进行友好交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党国际对外交往理念发生转变,并于80年代初期谋求超越意识形态差异、逐步推进接近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的交往创造了条件,进而助力中国共产党逐步与欧洲保守党、自由民主党、绿党等建立交往。新时代,面对西方国家以及少数欧洲政党炒作所谓的中国模式“威胁论”,中国共产党不断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以正视听。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sup>③</sup> 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上的风格与气度,对欧洲国家政党产生极大的触动。尤其是欧洲不少政党对中国共产党超越意识形态差异、推动全球治理、倡导国际合作抗疫予以高度赞扬。如欧洲左翼党第一副主席莫拉表示:“我们对中国支持和援助欧洲国家抗击疫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赞赏。欧中人民互帮互助展现出人类社会大家庭的深厚情谊,也激励着我们战胜疫情,走向更光明的未来。”<sup>④</sup>

## (二) 交流对话层次化、机制化

百年视野下,中国共产党与欧洲政党的交往对象由少到多、交往形式由单一到多元,迄今已形成多层次交往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关系以及中欧关系的发展,引发欧洲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对欧政党交流方式上实现了多样化,形成元首外交、高层访问、团组互访、实地考察、专题对话、中国共产党与一国执政党对话、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主要政党对话、中国共产党与次区域或地区政党对话等

<sup>①</sup>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sup>②</sup> 《对外交往摄影图片集(奠基篇)》,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07/66150/66152/66156/66202/index.html>。

<sup>③</sup>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7/1201/c1024-29681175.html>。

<sup>④</sup> 《外国政党政要高度评价中方积极支持其他国家抗击疫情》,人民网,<http://tv.people.com.cn/n1/2020/0320/c61600-31642050.html>。

较为成熟的双多边交流机制。就交往政党的光谱而言,包括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保守党、自由民主党、绿党、左翼党、民族主义政党、激进主义政党等。就政治地位而言,交往对象包含执政党、参政党及在野党等类别。在双边交往层面,中国共产党与欧洲国家政党建立了丰富多样的交流形态,尤其是与德国、俄罗斯等大国大党形成机制化交流机制。在政党交往中,青年政治家交往、地方党组织交流合作有所增多。党的对外工作职能部门还同英国48家集团、德国“中国之桥”协会、意大利议会“中国之友”协会等友好民间组织或半官方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此外,鉴于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等政党基金会参与对外交往及影响本国外交政策,党的对外工作职能部门及相关国内智库也与其开展一定的交流,引导其深化对华认知。在地区交往层面,中国共产党与欧洲社会党、欧洲人民党、欧洲左翼党等地区政党以及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人士进步联盟党团、欧洲自由民主联盟、欧洲绿党自由联盟等党团建立交往或联系,围绕中欧关系以及共同感兴趣的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广泛交流,增进政治互信。2011年11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第二次会议还由欧洲议会所有党团共同承办。在国际交往层面,中国共产党通过中欧政党高层对话、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共产党与工人党国际会议等多边平台与欧方政党进行广泛接触,深入交流思想,凝聚和扩大共识。从效果来看,机制化的中欧政党交流对话,有利于促进中国共产党传递声音,加强政治引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进务实合作、处理敏感议题以及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欧政党多层次交流对话日益超越双边意义,具有较强的战略性以及一定的世界意义。

### (三) 交流合作内容不断深化

中欧政党交往内容的时代性较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所侧重。如在革命时期,突出对革命道路的探索和交流,深化相互支持和声援;在建设时期,侧重交流社会主义建设路径,抵制西方封锁,争取国际进步力量对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改革开放后,双方对务实合作以及解决国家关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关注明显增多。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欧政党交往的领域日益拓展,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多个方面。其中,既有围绕人类命运和世界前途开展的战略对话,又有围绕具体议题进行的务实协商;既有单纯的相互交流,又有治党治国经验方面的互学互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与西欧政党交流对话,学习借鉴其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绿色转型等方面经验,助力国内经济发展。同时,欧方不少政党也对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做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上述政党既有相对落后的欧洲国家政党,也有发达的欧



洲国家政党,充分体现了欧方政党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如2018年3月,爱尔兰统一党副领袖、政府副总理兼外交贸易部长科文尼表示:“愿进一步深化爱中政治、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沟通协调。统一党愿增强两党交流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学习借鉴中国发展模式”。<sup>①</sup>目前来看,中欧政党大多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在不同层面进行广泛的交流对话并取得一些务实成果。由此促进欧方政党更深入地了解 and 认知中国共产党,助力中国共产党结交了一批真朋友、好朋友,推动中欧双多边关系的深入发展。

#### (四) 服务党和国家事业

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阶段性目标有所发展变化,但始终都以维护党和人民利益为重,在新中国成立后更是突出服务党和国家中心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中欧政党交往中党际关系与国家间关系既有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也有不对称发展的情况。对此,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与各类政党交往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国家利益优先的认识,通过有效的党际往来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促进国家间关系发展。毛泽东主席在对欧政党交往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维护国家利益的主张,但是相关政策举措已经有了鲜明的体现。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末公开表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sup>②</sup>这无疑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指明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引导中国共产党在对欧交往中努力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积极维护国家利益。东欧剧变过程中及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做西欧国家政党工作,为改善西方对华关系,乃至打破西方制裁做出积极贡献。如“1990年11月,中联部副部长李淑铮作为中共代表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第三十二次代表大会并会见该党总书记、副首相阿方索·格拉,对推动两党、两国关系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使得西班牙在放松对华制裁方面走在西欧前面”。<sup>③</sup>中国共产党还根据形势发展,要求欧洲国家政党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得侵害涉我核心利益。尽管有时受各种因素影响,相关诉求难以得到欧方整体积极回应,但也有不少欧方政党对中方予以理解和支持。如在南海问题上,保加利亚争取欧洲进步公民党、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以及斯洛文尼亚现代中间党等部分欧洲政党公开表示支持中国立场,反对所谓“南海仲裁”,呼吁争议各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分歧。2018年4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届

<sup>①</sup> 《宋涛会见爱尔兰统一党副领袖、政府副总理科文尼》,中联部网站, [https://www.idcpc.org.cn/bzhd/wshd/201912/t20191216\\_115202.html](https://www.idcpc.org.cn/bzhd/wshd/201912/t20191216_115202.html)。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sup>③</sup> 朱良:《试析指导党的对外工作战略思想的变化》,载《当代世界》,2010年第9期,第14页。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上明确提出:“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sup>①</sup> 这既对国家总体安全观起到管总的指导,也包括政党外交在内的国家总体外交的根本遵循。

#### (五)时常受到复杂国际关系的干扰

百年来,受国际关系深刻演变的影响,欧方政党、地区政党等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的态度难免会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甚至出现一定的消极动向。这种变化呈现时代性、阶段性、不均衡性及外力干扰性等多重特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西欧列强以反共为诉求极力维持在华特权,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敌意,公然扶持国民党反动派,意图扼杀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初,西欧国家受冷战思维影响,在美国领导下大多对华搞封锁和包围。除英国1950年宣布承认新中国、法国1964年与中国建交外,多数西欧国家往往对华态度冷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与西欧国家政党建立交往关系。1956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比利时众议院议长胡斯曼时表示:“我们主张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建立交流。现在我们同比利时、法国等尚未建交,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关系”。<sup>②</sup>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受中美建交影响,多数西欧国家纷纷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对开展党际交往还有不少顾虑,即便建立了党际关系也时常受到冲击。如冷战期间中法政党交往与中法两国关系出现明显的不平衡发展,经历了国家间关系与政党交往冷热两重天的发展态势。东欧剧变后,国际格局、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西方国家志得意满并炒作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西欧国家选择追随美国对华实行包围封锁政策、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抹黑,使得中欧党际关系一时受挫。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公开谋求遏制中国,妄想组织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部分欧洲国家政党、地区政党以及欧洲议会党团跟风配合,乃至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公然集体插手香港、新疆问题等涉我核心利益的事务。这不仅冲击了中方底线,而且给中欧政党交往及中欧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 三 百年中欧政党交往的经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欧政党交往经历风风雨雨,在探索中发展,在曲折中突破,形成了如今的中欧政党交往深层次发展局面,也积累了很多重要的经验。

<sup>①</sup>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4月18日,第1版。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462页。

第一,科学把握国际形势变化,稳妥推进对欧政党交往。百年来,国际形势、国际格局持续发展演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注意把握世界的变化方面,并着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努力找出最佳的应对外部挑战、规避外部风险之策,进而实现党的既定目标。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第一个对时局的看法并指出:“要解决纠纷的时局,必须由历年许多纠纷的事件里面分析出纠纷的共同病根所在然后才能够找出到真能解决纠纷的道路”。<sup>①</sup> 这为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道路的探索以及争取共产国际帮助提供了一些战略思路。针对“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逆流,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也重视争取西方国家支持,以遏制蒋介石打内战的图谋。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在对外交往方面形成新的思考和认识。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积极把握国际形势以及大国关系的新变化,积极推动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加强与西欧政党的交往力度。1981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会见法国社会党代表团时指出:“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战争的策源地是苏联。当然美国也是一霸。能够打世界大战的只有两家,美国和苏联。但美国在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苏联处于进攻地位。我们大家要联合起来,才能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迟战争”。<sup>②</sup>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获得代表团团长密特朗的积极回应,进而推动中国共产党与法国社会党建立正式交往关系。21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国际形势变化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紧密互动关系,努力维护和塑造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论断,引领国际社会共同破解全球治理“四大赤字”,倡导和推动各国政党一道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第二,强化政治引领,为中欧政党交往创造良好条件。百年来,中欧政党交往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始终存在并不时显现,但双方只要秉持以诚相待、平等对话、超越分歧、相互理解等立场,在求同存异中不断增加最大公约数,就可以开展正常的交往。对左翼社会党,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认识到彼此理念的差异,但也没有全盘否定尤其是对社会党左派和中间力量留有一定的余地,而且认为本着促进国家关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也是可以开展交往的。这让欧洲社会党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开明、开放。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过程中及之后,原苏东国家出现新兴政党不断诞生、不同类型政党激烈交锋以及政党力量此消彼长较快演变的局面。对此,邓小平同志指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

<sup>②</sup> 郭业洲主编:《长风破浪会有时——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九十年纪实》,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第166页。

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sup>①</sup> 这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妥善应对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带来的新变化，稳步开展对原苏东国家政党的交往。对于右翼保守党，中国共产党认为，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对某些具体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不应成为双方推进友好往来的障碍。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立场，契合了当时欧洲保守党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和对话的诉求，也促其在对华关系上采取相对友善的立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开放、透明、包容，大力推进新型政党关系，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对欧政党交往中保持了战略性、稳健性及引领性，增进了欧方政党对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热情和期待。

第三，深刻把握欧洲政党政治复杂性，创造性地推进中欧政党交往。从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来看，欧洲内部政治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较为突出，欧洲国家之间关系以及政党之间关系较为复杂敏感，发展中欧政党关系必须要把握好上述基本情况。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注意分析欧洲社会政治生态以及政党政治格局，结合双方的相互认知及期待，积极主动从指导思想、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以推动中欧政党交往的良性发展。在这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保持了较强的主动性和可塑性，让欧洲政党心悦诚服，进而推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对欧政党交往的跨越式发展。21 世纪以来，不少欧洲国家政党、地区政党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对欧交往的战略谋划和主动作为，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勇于同不同类型政党交流对话，也无惧直接的交锋。如 2016 年 10 月，在布达佩斯举办的“中国—中东欧政党对话会”上，匈牙利青民盟主席、政府总理欧尔班表示：“欧洲政党基本上是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划界而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个号召力，让几十个欧洲政党坐在一起，共商大事，寻求合作”。<sup>②</sup>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对欧政党交往中，重视发挥主场外交优势，将欧洲不同类型政党召集到一起，围绕一些重大议题进行交流，以凝聚广泛共识，协调一致行动。这种高效率的主场外交可以让欧方政党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治国实践，感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从而取得良好效果。

第四，坚持沟通对话，促进中欧政党交往的可持续发展。中欧政党从不讳言彼此之间存在的分歧，但总体认为对分歧既不能无视也不应夸大，而应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管控，并通过持续的对话沟通为消除误解误读创造有利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实践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3 页。

<sup>②</sup> 《海外版望海楼：“只有中共才有这个号召力”》，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1010/c1003-28763858.html>。

中也对交流对话伙伴形成更为深入的认知,即志同道合是对话伙伴,求同存异是对话伙伴,平等竞争也可以是“对话伙伴”。毛泽东同志重视参与党和国家对外交往活动,并愿意与各类外国人交流对话。他曾说过:“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国外的同志、朋友谈谈。连敌对的人,我也见见谈谈。”<sup>①</sup>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将国内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中欧务实合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欧洲在中国对外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中的重要性也有所提升。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与欧洲政党的各类定期或不定期交流对话,围绕涉及众多双边务实合作的一些重大议题进行深入沟通。2011年5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会见来华参加第二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的欧方政党领导人时表示:“中欧政党交往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欧政党领导人在相互交流中围绕双边关系的根本性问题及重大全球性问题开展深入对话,为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及共同寻找世界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发挥了积极作用”。<sup>②</sup>欧方也认识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必须正视中国的国际贡献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作用,需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交流。如2014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与德国社民党建立党际关系30周年研讨会上,德国社民党副主席君贝尔表示:“希望增进两党相互信任交往,推动德中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两党发展和两国关系注入新的动力”。<sup>③</sup>此外,在一些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善于把握欧洲内部政治的复杂性,通过有效的双边对话创造性地运筹政党关系,进而以点带面地促进中欧党际关系的深入发展,为中国争取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五,统筹推进对欧政党交往的“大协同”,体现国家总体外交的优势和特色。党的对外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在早期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对象大多位于欧洲,争取共产国际及其欧洲成员党的支持尤为重要,党中央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抓、亲自参与。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从成立长江局国际宣传组开始,党的外事机构开始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在党中央直接领导和最高领导人亲自参与下,统筹各部门各地方各领域对外交往渠道,充分调动政府、政党、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各方面力量开展外交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共同参与、各有侧重、相互配合的立体布局,凝聚最大外交合力。多年来,对欧政党交

<sup>①</sup> 蒋光化:《尽显人格魅力 纵论天下大事——〈毛泽东国际交往录〉评介》,载《当代世界》,2003年第12期,第43页。

<sup>②</sup> 《习近平会见出席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欧方政党领导人》,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ldhd/2011-05/17/content\\_1865017.htm](http://www.gov.cn/ldhd/2011-05/17/content_1865017.htm)。

<sup>③</sup> 《赵乐际出席纪念中国共产党与德国社民党建立党际关系30周年研讨会》,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4-11/17/content\\_2779977.htm](http://www.gov.cn/xinwen/2014-11/17/content_2779977.htm)。

往尤其是做欧洲重要政党、重要人物工作任务艰巨,表现在随着国际形势变化、欧洲社会政治生态演变以及中欧相互认知的变迁,对手、朋友、中间力量以及潜在可争取的对象往往处于变动中。这就需要发挥国家总体外交优势,推动政府外交、政党外交、议会外交、军事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等统筹协调,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协力做欧洲一些重要政党、重要人物工作;尤其是逐步加大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分量,通过与欧洲智库、政党基金会、民间组织、知名媒体等交流沟通,深入影响欧洲社会对华认知,引导其正确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的和平发展,使其在一定层面形成中国的和平发展既是中国之福也是欧洲之福、世界之福的认知。

#### 四 未来中欧政党交往展望

中欧都是世界主要政治力量,承担了重要的国际责任。中欧政党应肩负历史使命,密切交流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推进中欧全方位战略合作,而且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为中欧政党交往创造良好政治条件,强化中欧政党交往的政治引领性,提升中欧政党交往的现实贡献,可谓恰逢其时。

##### (一) 从战略高度重视中欧政党交往与中欧合作

中欧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有着重要的全球战略意义。加强中欧合作是双方的共同需要和战略选择,重点在于实现长远的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共同努力。习近平主席历来主张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并为此不断与欧方进行双多边战略沟通与对话,引领中欧战略合作稳步发展。2020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时说:“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合作什么,具有世界意义”。<sup>①</sup>2021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边框架下与包括欧方在内的一些国家、地区组织及国际组织围绕全球气候治理、人类卫生健康等议题进行战略交流,阐释中国立场、论述中国贡献、传递中国愿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当前,欧洲国家尤其是欧盟国家也在广泛讨论中欧合作,大多认为“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持续演变的背景下,问题不在于是否与中国合作,而在于如何开展合作。中国的发展确实是在影响或重塑世界,但也需要看到中国正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前进,它不想重复西方的老路,而是寻求走一条自主的道路”。<sup>②</sup>

<sup>①</sup> 《习近平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0-06/22/content\\_5521150.htm](http://www.gov.cn/xinwen/2020-06/22/content_5521150.htm)。

<sup>②</sup> Agota Revesz, “Europe Looks at China as both a Strategic Competitor and a Partner,” <https://brusselsmorning.com/2021/03/01/europe-looks-at-china-as-both-a-strategic-competitor-and-a-partner/>。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给世界带来重大挑战,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面对世界危局和变局,各国政府和政党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也肩负着国际社会的广泛期待。在此情形下,加强中欧政党交往、深化中欧合作比以往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欧政党应坚持战略眼光、保持战略定力,在发展双多边政党交往时避免受制于欧方少数政党、地区政党及欧洲议会党团,超越中欧某些具体的现实分歧,切实管控第三方因素干扰,并彰示对中欧共同利益以及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注。这是推进中欧政党交往的内在需求,无疑需要双方携手合作。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21年1月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淡化了美国要求欧洲在美中之间选边的要求。她表示:“我非常希望避免建立集团。如果我们说这边是美国,那边是中国,而我们则围绕这边或那边来结盟的话,这对许多社会都是不公平的。”<sup>①</sup>这既向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也给欧洲政党及政治家做出了良好示范,并产生了一定的欧洲社会政治效应。

## (二)以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引领中欧政党交往新发展

中欧政党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发展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历来有之,但应该看到“不同文明的多元共生才是常态”。中国共产党尊重欧洲政党的价值理念及发展道路探索,支持欧洲战略自主以及欧盟一体化进程,谋求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扩大交流合作。欧洲政党、政治家也必须接受中国人民的制度选择以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客观看待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世界影响力的扩大,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诉求;而不应将经济议题政治化,更不应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乃至推行所谓的制裁。如果欧方部分国家政党、地区政党或欧洲议会党团无视基本国际关系准则,肆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恶意挑衅中国核心利益,必将遭到中方的强烈反对和反制。更何况欧洲国家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单边主义等问题日益突出,却仍在人权等议题上搞双标,这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如爱尔兰籍欧洲议会议员克莱尔·戴丽(Clare Daly)近期在接受《今日俄罗斯》采访时表示:“欧盟到处告诉世界其他国家,其是民主的伟大捍卫者,但这一切都与民主无关。”<sup>②</sup>

当前,中欧政党交往应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倡导求同存异,进而促进双方政党各层面交流合作。欧洲一些国家政党、地区政党及欧洲议会党团还需要切实把握中欧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和主基调,走出认知误区,避

<sup>①</sup> Alessandra Scotto di Santolo, “Angela Merkel Delivers Blow to Joe Biden as She Sides with China against EU-US Alliance,” <https://www.msn.com/en-gb/news/world/angela-merkel-delivers-blow-to-joe-biden-as-she-sides-with-china-against-eu-us-alliance/ar-BB1d8un2>.

<sup>②</sup> “EU Making Russia into ‘Phantom Enemy’ for Geopolitical Reasons, Shouldn’t Lecture others about Democracy—Irish MEP to RT,” <https://www.rt.com/news/515209-mep-daly-russia-europe/>.

免空谈,主动接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持续开展沟通并与中方相向而行,进而寻求推动双方改善关系、扩大合作的路径与方案。

### (三)把握形势需要聚力推进中欧政党务实合作

当前,中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欧盟则上升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不断增强的务实合作不仅惠及中欧双方,而且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正能量和确定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欧都对彼此在各自外交中的定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欧方虽然对中方存在一些错误认知并亟待改正,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妨碍双方求同存异,继续深化务实合作。如2021年4月,中法德三国领导人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之前举办气候视频峰会,进行对表,并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中欧关系、抗疫合作等重要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法德领导人对峰会成果非常满意,对中方担当和作为予以高度赞赏。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欧盟委员会支持中欧投资协定,认为协议不仅有助于减轻疫情对欧洲的经济影响,而且有助于欧洲企业进入中国电信、金融、电动汽车等市场,但欧洲议会近期却无理“冻结”关于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讨论,让世界为之错愕。上述恶劣做法无疑毒化了双边关系氛围,产生消极影响。

面向未来,中欧政党需要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在扩大交流对话中消除可能的误解误读,并采取切实的措施巩固和增强双边务实合作,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展现大国大党担当,用好现有的政党对话平台,积极接触和沟通对话,协作解决一些事关全球发展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大事,助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如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倡导多边主义,促进开放经济和自由贸易,加强在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合作抗疫等方面的协作;加强在绿色发展、创新发展、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动中欧可持续发展;增进文明交流互鉴,扩大相互理解和认同;坚持共建共商共享原则,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动相关合作项目开花结果,惠及相关国家人民,实现双赢、多赢。为此,部分欧洲国家政党、地区政党及欧洲议会党团应正确看待中欧关系,强化主流是合作、竞争是良性、共赢是取向的认知,与中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中欧关系稳健走向第二个一百年。

(作者简介:石晓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政治与政党外交研究院研究员、执行院长;责任编辑:宋晓敏)